

有根的诗学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

侯
敏
著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新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有根的诗学

侯
敏
著

新
生
代
学
人
丛
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侯敏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新生代学人丛书)

ISBN 7-208-04722-7

I. 有... II. 侯... III. 诗歌—文学理论—中国—现代

IV. 1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58585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新生代学人丛书 ·

有根的诗学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

侯 敏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125 插页 4 字数 203,000

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7-208-04722-7/B·392

定价 19.00元

序

读本书首先会想到,今日研究新儒家文论有何意义?

新儒家是在“五四”“打倒孔家店”、彻底反传统的文化思潮中,中国学术界走出的一群坚守中国传统文化和传承儒家思想的人文学者。面对滚滚西潮,他们认定儒家思想是世界文化思想的精华,建设中华现代文化不能离开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阐扬。他们回应 20 世纪的新变,“援西入儒”,梳理儒家原理,返本开新,重新阐发、弘扬。他们以丰赡的理论著述与精深的哲学思辨,构建起富有现代色彩的新儒学,实现了儒学在 20 世纪的创造性转化。尤其是从 50 年代开始至 70 年代,他们流落台港,此时中国大陆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愈演愈烈,而他们花果飘零,易地发展,执着于中国文化灵根再植。如今在大陆之外的港台与海外华人地区,新儒学思想影响宏远,蔚然一大学派。若论 20 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四顾寥落,当以新儒学为成就最著,也最具理性活力。

新儒家对诗学、美学发表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思维精深,见解独到。新儒家的主要成员都有诗人情怀,钱穆、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可称为诗人哲学家。他们秉承中国传统治学特点,文思哲不分家,史学、诗学学养深厚。方东美强调“一身而典‘诗人、圣贤、先知’三重身份,才能宣泄他们的哲学睿见”。诗学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方东美将世界分为六个

层级存在,以艺术境界、道德境界、宗教境界为“超越界”。他认为哲学的最高智慧源于艺术经验。其生生哲学之发端,是在艺术经验的自由与逍遥中,体验创造生命之流新。因此,新儒家谈艺说文、评诗论美不是他们哲学冥想之余兴,而是新儒学思想体系之重要构成。新儒学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艺术人生或诗化人生就是新儒学要创造与彰显的诗学宗旨。在本书中,侯敏概括为哲性诗学观(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人生文学观(钱穆)、仁道美学观(唐君毅)、艺术心灵观(徐复观)、“生生”诗学观(方东美)、审美范式观(牟宗三),阐述了新儒家诗学的文化观照、生命聚焦、观念综摄、范畴转换的丰富性、深刻性与创新性,以及“人化”、“心化”、“生化”论对于传统诗学的创造性转化。如果不抱偏见,应该承认新儒家文化诗学对于中国传统诗学“进行了颇具意义的现代转换”,“是以传统文论为主体融合中西美学的颇有价值的尝试”(侯敏语),是中国诗学在 20 世纪的创新。

在今日文化全球化语境中,新儒家诗学对中国现代文论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20 世纪百年中国文论建设基本走的是“西化”路线。将“西化”等同于“现代化”,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开其端,胡适、陈独秀、周作人、鲁迅、茅盾等人都以引进的西方文论作为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目标。从“五四”时期介绍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新浪漫主义,到 30 年代左翼文学提倡普罗列塔利亚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鲁迅介绍普列汉诺夫,周扬介绍别、车、杜,“十七年”文学引进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传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直至新时期一波波引进西方理论新潮,从精神分析学、原型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叙述学、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将西方 20 世纪百年理论更迭在短短 20 年间几乎全部纳入中国文论框架。每一种新论都是浅

尝辄止,蜻蜓点水,匆匆收场,急忙忙又去追赶更新的浪潮。其结果是,我们至今没有形成哪怕是一种成体系的文学理论,更遑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经过百年文论的“西化”,我们现有的文学理论已成为西方文论的“大拼盘”,诸色杂陈,唯独就是没有中国自己的声音。20世纪中国文论的“失语”,已是一个令有识者惊心的事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观、文化观先是追随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毛泽东的提倡下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文学观,近20年亦步亦趋西方后尘,致力于将西方的一波波新潮忙不迭地载入中国,中国本土的诗学、美学和审美标准、审美趣味被判为“陈旧”弃如敝帚,我们已经不用中国自己的文学观美学观、中国人自己的美学标准审美趣味去鉴赏分辨中国文学与艺术,我们目前所零敲碎打使唤着的文学理论、美学理论都学自西方。更有甚者,本身从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中产生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曾在50年代遭遇以“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为理论框架的支解,后来又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条路线来划分中国古典文学繁复独特的发展史,现今则以多种西方新观念、新术语来分解中国古典文学。面对当今全球化语境,更有甚者提出“在使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暂时借用西方的话语(包括批评话语和操作的言)与之对话”。按有的说法“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接纳和赞赏”,“首先就是要善于理解别人,主动赞赏和接纳别人优秀的东西”。他们担心若以中国文论自己的话语与文化身份,将不被西方人理解,就无法被接纳与进入文化全球化盛宴。似乎我们只能学着说别人的话语,才能被别人理解与接纳。因此必须尽快地丢掉自己的话语与文化身份,拼命地牙牙学语,以与西方文化一样的话语与文化身份呈现。我们主动寻求、积极模仿、热情应变的结果是自我实现了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

霸权,以西方文论——西方人的诗学与美学来审视、评价、指导中国文学。这好比我们享用着中国美食,却要用西餐的标准与要求去评价中餐,用欧洲庭院的艺术标准去评价苏州园林。

百年中国文论“西化”的结果,我们没有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没有自己的文论话语,没有自己的声音。按照这一文化取向,弱势民族的文化将被消亡,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全面西方化。

在百年中国文论的探索潮流中,新儒家诗学悲壮的努力尤为可贵。

新儒家文化诗学显示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本土美学与艺术精神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面对“五四”全盘反传统,置身 20 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与冲突潮流,新儒家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之根,也是世界文化思想之精华,他们以传承文化命脉为己任,并以此为资源,致力于重新阐扬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核与中国艺术的美学精神。他们从中国传统哲学中演化出人化论、心化论、生化论,自成一统,展开美学思维。新儒家文论是有根的文论,新儒家诗学是中国文化哲学视域中的诗学,具有中国文化哲学的特点,新儒家诗学话语也是中国本土文化话语。他们不仅梳理出“道”、“境”、“和”、“游”、“心”等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创造性诠释,而且他们的诗学与美学的核心理念就直接诞生于中国文化哲学。新儒家诗学以中国哲学之“天人合一”、生命意识为中心,牟宗三认为两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钱穆主人生文学观,古人称文学为文心,“文心即人心,即人的心性,人之生命所在”。唐君毅构建仁道美学观。徐复观指出“人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精髓”,他的美学观阐扬心性之学,审察艺术心灵。方东美则以《周易》“生生之德”之哲学基点新创生生诗学。

新儒家诗学也吸纳西方理论,但是他们不追逐“西化”潮流,不克隆与全盘照搬西方理论。他们是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因应20世纪中西文化的时代冲突,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以“平视”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依据主体需要吸纳西学,“援西学入儒”,会通中西,重铸儒学。这源于新儒家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同时他们对西方哲学无论是古典的还是当代的,都下过深入研究的真功夫。唐君毅深探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被称为能“出入其中,吞吐自如”。牟宗三只手全译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康德道德哲学》三部哲学巨著。方东美的“生生哲学”融柏格森、狄尔泰、怀特海哲学理论,吸纳康德、黑格尔哲学思维,匠心独运,自成一体。新儒家并不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不是在传统儒学或宋明理学的旧理论框架内翻斤斗,向现代社会兜售陈旧理论。新儒家志在为20世纪现代社会东、西方提供圆满的人生理论,故而吸收西方现代哲学理论,实现儒学的时代创新,就成为他们理论构建的目标。其文化诗学也是如此。对于中国传统诗学,新儒家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融会中西,重构新思。无论是新儒家哲学还是诗学,都已不再是中国传统儒学与传统诗学。新儒家诗学所构建的“人化”、“心化”、“生化”理论,灌注着灵动的生命意识、淳美的艺术理想、高妙的人生哲学理念和一以贯之的人文情怀,是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发展,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诗学。

新儒家以20世纪中国文化的边缘处境,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担当起返本开新、振兴中华传统的文化使命,直至向20世纪西方学界宣讲中国哲学与诗学智慧,以其中华本土文化话语与文化身份建立了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资格。方东美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因有感于西方对中国哲学之隔阂,和中国人不重视中国哲学智慧,乃尽辞西方哲学课程,专事讲授中国哲学。1964年

他在美国举办的东西哲学家会议(真正的国际对话)上发表研究中国哲学的论文,被西方学者誉为“通篇具权威性”(authoritative throughout),并雄辩英国教授,获全场掌声,会后有许多西方学者排队和他握手。在文化全球化中,我们拿什么去与西方文化思想对话与交流?我们应该创造怎样的文化对话语境,才能与西方文化的对话与互动是平等的?事实上,在东西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国际化语境中,新儒家所宣讲和弘扬的中国文化与智慧是真正能够同西方文化思想对话、较量、给予互补,并且以其深刻丰富的中国文化智慧赢得西方对手赞扬与敬佩的。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只有无奈地藏起中国本土的东西(是否因为见不得人),学说着西方的话语才能为对方所理解与接纳。尽管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国家、地区的差异,一元和多元的冲突将持续存在,西方强势资本主义势力早就按自己的愿望,以自己的利益与需求为价值标准对全球化从内容到形式安排就绪,但是真正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全球化不应以压抑弱势民族的存在为代价。文化的全球化也不应是西方文化一体化,全球化是世界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与融合互补,不应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霸权与侵吞。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应有多种途径和弘扬本土特色。新儒家思想以创造性转化的成功获得在东、西方文化国际对话中的重要地位,这对于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化如何面对东西文化冲突、因应全球化与本土化的挑战,具有启示意义。

也许是新儒家哲学的名声太大因而遮蔽了其诗学的成就,新儒家的诗学资源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1997年我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主办的国际儒学研讨会,三百多篇论题中无一篇是讨论新儒家诗学的。我也曾询问香港、台湾的教授,答复是钱穆百年诞辰研讨会,向大会提交的二百多篇论文中亦无一篇

讨论文学与诗学的。其实钱穆就有许多文论。而大陆文论界奉“西化”为圭臬、唯新是趋,对坚守传统的新儒家诗学不屑一顾或浑然不知。鉴于此,我建议侯敏以新儒家文论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侯敏原来师从南京大学包忠文教授研究现代文艺理论,后在苏州大学从事文艺理论教学十余年。他为人诚笃,学风扎实。他原先已经完成了20世纪中国文论的专论,但接受我的建议后改做新课题。一个有重大价值的新研究课题往往是艰深的。新儒家文论广泛布嵌于其弘博的哲学论著中,其阅读量惊人,而且新儒家文论表述古奥,又有独特的哲学思辨。侯敏沉下心来,一本一本地攻读新儒家的原著,掘井及泉,认真体认。在《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中,他对被长期忽视的新儒家诗学思想作了细致的钩沉、深入的思考与系统的梳理阐发,以沟通中西的学术眼光,揭橥出新儒家哲性诗学的特征,又以人生文学观、仁道美学观、艺术心灵观、生生诗学观、审美范式观概括与阐述钱穆、唐君毅、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的诗学论述。美学史家朱立元教授评为:“对当代中国文论如何抵御西方文化霸权,创造、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的重大问题,给予了自己的解答。”文艺理论家鲁枢元评为:“能放言于心声,中的于现状,为在危机四伏的世界文化格局中确立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艺术精神、诗学原则,提供了有力的支援。”文艺理论家董学文教授指出:“这在学科和学术建设上是有贡献的。”(以上评语摘自博士学位论文评阅书)。

现在,《有根的诗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的出版,这或许给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中国文化和文论的走向提供一些思考。

朱栋霖

2003年5月23日

导论 中国智慧的诗学建构

20 世纪末随着“儒学热”与“国学热”在中国大陆的升温,现代新儒家的思想学术受到久违的重视与滞后的青睐。现代新儒家思想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重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哲学界人士对新儒家的学术思想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新儒家的哲学本体观、方法论、历史观、宗教伦理观、人生哲学观、文化哲学观和社会文化观得到充分揭示。作为原本蕴发于大陆、播迁于港台、影响东亚、驰誉欧美而再反馈于本土的这簇幽兰,现代新儒家自有值得人们蓦然回首的巨大精神磁场和开蕴示奥的丰富理论资源。但是,与之不相称的是,新儒家著述中所蕴藏的诗学思想没有获得学界的重视,除少数几篇论文给予过匆匆的一瞥外,目前尚无学术专著全面而系统地探讨这个问题。

现代新儒家文化诗学研究之所以遭遇冷寂,我想原因大概有三:一是学科视野的限制。现代学术分工越发细化,专业学人往往各执一隅之解,鲜能博观。而新儒家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印贯穿的学术大师。他们一如独立书斋啸晚风的文化骑士,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的智慧,以哲学的智慧浇灌艺术的生命,有着绵长修远的思索。倘若拘限一隅,我们对新儒家这样一群真积力久的人文学者的学术思想,就难以做到略迹原心,融通圆照。二是学术光点的遮蔽。新儒家一般以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见长且闻名

于世,哲学和思想史研究是其学术思想的主旋律,而诗学则是他们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时隐时现于新儒家的学术著作中,为思想整体所涵盖和包容。倘若不能静下心来捕捉与梳理,我们就难以掘发新儒家学术话语中蕴涵的诗学世界。三是学界阐释的忽视。在整个20世纪中国诗学理论的运衍过程中,有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这三大思潮和流派。对于前两种,学界研究的较多,这类聚焦显势的研究是应该的。但相形之下,新儒家文化诗学的研究几乎是一个学术空白点。由于新儒家在思想边缘处思索,加上他们后来转蓬于海内外,学思历程复杂,所以他们往往被摒弃于中国现代诗学和美学家研究的名单之外。笔者以为,新儒家的文化诗学是一种生成于宏观思想文化进程中的美学,它同20世纪中国的文化转换进程、现代诗学的多元建构保持着张力,呈现出特有的思想风景。不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文化诗学,中国现代诗学理论史和美学史是不完整的,也就不能体现中国诗学在20世纪的真实发展。新儒家的文化诗学显示了20世纪中国诗学寻根自立的精神取向、内化外来思想的学术能力。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植根于中国智慧的诗学建构纳入20世纪中国诗学理论谱系。

一、置根落实:精神家园的复归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产生于西学东渐、传统崩坍的特定时代,其生成背景之复杂、演进过程之曲折,令当代学人有扑朔迷离、流转不定之感。但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文化向度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种形式来进行的。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追求与西方主流文化一致的思想形态,致力于启蒙话语的张扬,离异本土传统文化,以异质、异源的文化作为理论建构的主干,铸造理论的

新形式;而另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以民族文化为认同与传承的对象,他们了解西学,但不迷信西学,将目光从西方主流话语转到本土文化传统的发掘与守护上。前者狂飙突进,后者返本开新。新青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代称)属于前者,而新儒家属于后者。

回眸新儒家的学思历程,我们发现他们是在 20 世纪上半叶开始学术方向上的由“西学”向“中学”的转向的。当新青年“离家”之时,正是新儒家“返乡”之日。民族文化是现代新儒家诸贤薪向的文化归途。新儒家守护文化传统,把握文化之根和民族之魂,目的是返本开新。新儒家的学术生命呈现了一种文化使命感与归属感,在“花果飘零”的悲情与“灵根自植”的寻索中,新儒家铸造出国故新知的学理范型。诚然,新儒家诸贤有着“家族的类似”,尽管各人“还乡”的契机与学术的归趋并不完全相同。

新儒家的开山人物梁漱溟出身于一个儒学传统较为深厚的家庭,但他的启蒙教育主要是西式的。而在五四时期,他不满足于新青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叛,一反当时的西化潮,归宗儒家。在中国文化意义危机的情势下,梁漱溟展开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1921 年出版了根据其讲演整理而成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究元决疑,抉发孔子的生命哲学和道德境界,呼吁再创宋明儒学之风,复兴儒学,预言世界文化会走上中国之路。在众人皆醉心于西学时,他发起另一种自觉,回抱中华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致力于中国心灵的呵护。

方东美是清代散文大家方苞的后裔,从十三岁起读《诗经》,在儒学的家庭气氛中长大。但是进了大学后,他成为“少年中国会”的积极分子,兴趣在西方哲学,曾经留学美国,所读之书 and 所教之书也大多关涉西方哲学。30 年代初方东美思想有了转变,觉得应当注意民族文化中的哲学,于是逐渐由西方转向东方。

他把这种转向称作“浪子回头”，并且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承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应当在这种优美的精神传统中，先自己立定脚跟，再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展内在的宝贵生命和创造精神，然后培养我们内在的智慧，虚心反省自己的优劣；再原原本本地去看西方文化，以取法乎上，得乎其中。”^[1]方东美重新发现了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核和中国艺术的审美精神，并以此作为原创理论的精神家园。

牟宗三也经历了由“膨胀耗散”到“照察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把自己早年向外膨胀、醉心西学时期称为“泛滥浪漫之阶段”，差不多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泛滥浪漫阶段隐退。家国天下的多难，民族精神的呼唤，使牟宗三收摄精神，反求诸己，归宗儒家，重开生命之学问。他醒悟到“实在有使其置根落实的必要，置根是对前面所说的拔了根说，落实是对于前面所说的挂了空说。”^[2]牟宗三厌倦了“拔根”、“挂空”，走向了置根、落实，以期建立“精神上的根据”。

唐君毅的思想历程同样有过文化意识上的转变。年轻时期的唐君毅泛滥于西哲百家，钟情于英美新实在论，他的钟摆是荡开去，对本土哲学没有兴趣。直到三四十年代在熊十力的影响下他才对深根于中国智慧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理性有所契悟。后来他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中，总结了五四以后自己及同时代一批学人学思转变的过程：“至对中国文化问题，则十年来见诸师友之作，如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之论中国哲学，钱宾四、蒙文通先生之论中国历史文化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先生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先生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程兆熊、李源澄、邓子琴先生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及其他时贤之作，皆以为可助吾民族精神之自觉。”^[3]从唐君毅对一代学术大师重构传统文化的描述中，我们

可以看出,当时的学人学思的转变不是个别情况,而是较有普遍性的自觉选择。虽谈不上是文化领域的“集体大逃亡”,但这毕竟反映了现代学人从文化漂泊中醒悟过来寻求理论归宿和整合的动向。五四以后,一批学者由西学转向国学,由现代性的“自觉”转向本土性的“觉自”,从急功近利的反传统主义转变到深切体味的新传统主义。正是这种反身而诚的生命回向,造成了中国民族文化学术的“一阳来复”,造就了一批蜚声学坛的学术大师。作为新传统主义的主要代表,新儒家秉持作为个人认同对象与民族生命归依的文化主体,以中国文化元典为内核,观照西方,剖析中国的社会文化、历史文化和审美文化,在葆有精神个体性形式的学术原野上犁出了现代诗学建构的学术进路。

新儒家有着丰富的文化理念,落实到诗学上,他们善于把握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的精髓,从中西对比中找出中国诗学的特殊点。中国文化的特质是新儒家注目的焦点。新儒家认为,“天人合一”与“天人二分”构成了中西文化的分野。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看,中国古人大多讲天人合一,而西方文化传统大多讲天人二分。欧洲哲人坚持主客相对,用理性的分析方法剖析人的世界。与西方不同,中国哲人青睐心物感应、妙悟自然,把人当作知情意有机统一的整体来进行把握,中国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人生哲学,这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与诗学形态的生命化与境界化。由于中西方是按照各自的文化精神来理解宇宙与人生的,故中西方创造出的既反映世界又表达内心的诗学形式当然也就会不同。新儒家从各个方面阐述了民族文化之根与诗性智慧。

历史文化。新儒家特别醉心于“轴心时代”的中国历史文化,把它看作是源头活水和精神渊源。在文化历史的研究中,新儒家要求先对本国以往的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提出的

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就很有代表性。钱穆认为正确的历史文化观是要根据历史。即历史与文化讨论要有凭有据,把哲学智慧与历史事实结合起来。这种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论,表明了钱穆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他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钱穆称中国文化“如一树繁花,由生根发脉而老干直上,而枝叶扶疏,而群花烂漫。”^[4]他主张中国文化重建的道路为据旧开新、老干萌新。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熊十力认为中国文化艺术性格主要是由儒道二家塑造的。体乾而贵刚健的儒家思想,造就了行健不息的文化风貌;法坤而守虚静的道家思想,培植了绵绵若存的文化格调。唐君毅进一步补充说,在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与之相联系,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兼含儒道主义,只是或有偏重而已。因此,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文学与自然山水文学颇为兴盛。

历史解释只能是对传统的再诠释,对“前理解”的新理解。新儒家的历史理解有一种“精神的在场”。他们意识到,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岁月汰洗以后留下的“根”,是华夏先民厚德载物的“积淀”,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伟力之源。新儒家始终认为,在一个世变日亟、新潮沓至的时代,如何承传历史的慧命,立定自己的脚跟,才是最重要的。梁漱溟指出:“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的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5],这个“民族的根本精神”便在文化中,便是儒家的伦理理性。他认为民族生命、文化生命不会遽亡于一时之武力,而终制胜于文化。

人文意识。站在文化哲学的立场上,新儒家以东方“人文化成”之道中引出的人生或文化价值的探究为哲学归趋。他们强调中国文化的中心特点是人文主义。唐君毅确认中国古代胚孕

了一种内在的人文主义,儒家传统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在于:通天地,成人格,正人伦,显人文。牟宗三更是直截了当地宣布儒家为人文教,中国的文化生命是人文教的文化生命。那么,中国人文思想何以特别发达呢?新儒家立论的理由是,中国文化源头偏重于利用厚生和审美情趣两个方面,此皆是以人为中心所展开的活动。超人文的宗教和非人文的科学为中国文化所缺少,而人文精神之重要体现的道德和艺术,又是西方文化中发展得不圆满之处。道德和艺术的基本特征是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与对立,这是它们与科学认识论最大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中科学的因素没有得到发展,而在道德精神支配下的艺术则发展得相对成熟,也比较符合艺术的本质。

在文化哲学上,新儒家全力张扬充满东方古典情趣和伦理色彩的人文主义,这种研究同他们剖析中国艺术与美学问题紧密相连。古典人文主义见之于中国的文学艺术,中国的文学艺术妙契古典人文主义精神。在人文之“思”与人文之“诗”的玄览中,新儒家从人生境界进入审美境界,进而对艺术心灵探幽发微。

心性之学。以“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为思想主旨来阐扬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内涵,是新儒家的共同认识。熊十力重视“本心”,贺麟演绎“逻辑的心”,唐君毅与牟宗三强调“道德的心”,将心性引向天人之际,探讨形而上意义的心。徐复观独辟蹊径,在现实的人心和人性中探究心性。新儒家继承了古代的心学,用心性情怀去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魂。心是人的主观生命、精神生命,人之性通过人之心的种种活动表现出来。性是本性、义理,心是生命活动或过程本身。用现代新儒家的话来说,性是存有而不活动,心即是存有,即活动的真实生命;心性之学